

纪初)，500 来年才得恢复。人口恢复到汉代水平，金属货币又代替布帛。

这情况，不是战争所能解释的。战国是战争最多的时期，但战国时期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简单的讲，汉魏之际的社会经济的变化应从战国秦汉的社会生产结构中去找原因。交换经济的发展，促使土地兼并、农民破产流亡，变为奴隶。我虽不愿称我国秦汉为奴隶社会，但我承认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代。大量劳动力离开土地，使“耕者不能半”，大量游手集中在城市，必然导致农业衰落。我们在这方面的发掘、研究是不够的。

我认为，我们对殷周之际的社会变化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情况，战国秦汉城市经济繁荣的情况以及汉魏之际的社会变动情况的认识和估计，都是不足的，或不够重视的，这都影响了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变化的认识。

中国历史发展体系的新构想

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 田昌五

用五种生产方式斧削中国历史，是不适宜的。首先，五种生产方式是按照欧洲的历史提出来的，所以只适用欧洲的历史，与中国历史是不切合的。其次，五种生产方式只是一种逻辑概念，与实际的历史是有出入的。如所周知，马克思着力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破坏了或改造了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把这些生产方式按历史顺序排列下来，就构成了五种生产方式。其实，任何社会的经济形态都不是由单一的生产方式构成的，而是由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分配方式构成的。例如，马克思还提到过一种手艺人或小农的生产方式，就未包括在五种生产方式中。再说，马克思对生产方式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上述生产方式，另一种是劳动力和生产手段的结合方式和方法。如用不同的工具和技术进行生产就有不同的生产方式。现在我们所说生产方式多半具有这种含义。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五种生产方式作为划分社会形态、甚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工具。第三，我们现在所说五种生产方式的含义是由斯大林定下来的，未必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例如，马恩说的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就不能和奴隶制画等号，更不能把古代社会简单地说成什么奴隶社会。诚然，古代社会中包含着奴隶制，但由此称之为奴隶社会，那就错了。这种说法出自列宁，而尽情予以发挥的则是斯大林，严格地说，斯大林的奴隶制定义也是不准确的。此外，斯大林对农奴制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解释，以及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解说，也是大成问题的。例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力原本包括劳动力、生产手段、生产资料、生产管理、科学技术等诸多因素，他却简化为劳动力和生产工具两种因素。这样，当我们用他说的五种生产方式解决中国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时候，歧义百出，久拖不决，也就不足为奇了。有鉴于此，我们必须放弃用五种生产方式套改中国历史的做法，另行考虑解决中国历史发展体系的途径和方法。

怎么解决中国历史发展体系的问题呢？我认为，关键在于正确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中国历史的辩证的发展过程。我们以往的错误，就在于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五种生产方式作为公式和套语，强加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这样，表面上看似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的。

我过去也是信奉五种生产方式，以此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但在“文革”后我改变了，改变的原因在于接受了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

论重新考虑中国历史的问题。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探索，我终于提出一套新的中国历史体系。按照这套体系，中国历史可分为三大时代。即：一、洪荒时代；二、族邦时代；三、封建帝制时代或帝国时代。

洪荒时代讲述的是从生物人到社会人的进化史，亦即人类起源史。这个问题是19世纪提出来的，而其解决则在20世纪。人类的前身可以上溯到1000万年前的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而与人类起源有直接关系的则是6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在它们中间出现了能直立行走的古猿，这就是最初的人了。所以人类的历史至少有500万年。循此前进，经过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到5万年以后发展为晚期智人，才真正成为与现代人没有区别的社会人。人类的产生主要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如印度洋板块脱离东非漂移到亚欧大陆，数百万年的冰川运动，等等。由此才能说明，为什么现在的高级类人猿，即使能使用多种工具，也不能转变为人了。对这数百万年，我称之为洪荒时代。

族邦时代指中国古代社会。中国也有过氏族社会，但可能出现于早期智人阶段，至晚期智人而趋于成熟，此后就开始瓦解了。证据是：一万年前的某些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许多火塘，这说明已有夫妻生活，脱离了氏族群婚的时代。因此，我认为那时的社会群体是由氏族、家族、家庭构成的，而横亘于相关氏族之间的则是氏族。大约在6000年左右，氏族被家族瓦解了。证据是：这期间出现了迁徙合葬墓，而不是同一家族的死者是不会迁葬到一起的。但此后的家族并未瓦解，而是由家族组合为宗族，进入了文明社会。所以中国古代社会中就存在着氏族、宗族、家族、家庭体系。

中国古代国家是以宗族为载体的，所谓族邦即宗族城邦。在中国古代，族权和政权是一致的，宗统和君统是一致的。所以，族邦的初级形态由宗君来代表，而以宗庙和社稷为特征和标志。其发展的形态则有天子、诸侯、公卿大夫等等，但他们不过是不同层次的宗主而已。中国古代的等级关系也是按宗族来划分的。在中国古代，社稷和国家是同义语。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用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横加于中国古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对中国古代的土地问题，也要从这里找答案，即宗族土地所有制或多层次的宗族土地所有制。井田制源于家族共耕制，后来发展为宗族土地的管理制度。有些人不明于此，将井田制比附为农村公社，这是根本错误的。试问，哪有实行共耕的村社呢？奴隶制也以王室、公室、宗室、家室的形态而出现，这是另一种类型的发达奴隶制。说它不发达，是不符合事实的。

封建帝制时代取名于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而帝国时代则取自于历史命名之通例，如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波斯帝国、莫卧儿帝国、大蒙古帝国等等。这个时代从战国开始至清朝灭亡为止，长约2400年。我们可以按其自然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前帝国时期，或称第一帝国时期；中帝国时期，或称第二帝国时期；后帝国时期，或称第三帝国时期。每期各约800年。

这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并不是直线式运行的，而是周期性循环演进的。分为三个时期，实即三个大周期。这种周期率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如从大分裂到大统一就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和重复性，从土地国有转化为土地私有也有周期性，赋役制度的演变具有周期性，汉民族的更新换代和相应的民族关系具有周期性，农民战争可分为三个重复进行的阶段，法律制度可分为三个反复发生的时期，地方行政建制也可分为三个阶段，思想文化可依玄学、理学和实学分为三个时期，民族危机和民族复兴也是周期性发生的，工商业的发展也可分为三个大周期，宦官专权与党争在三大周期中是重复发生的，等等。这种周期性不是同一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而是三个类似的社会形态的运行过程。据此，我提出了大循环论或大回旋论。有些人认为这有历史循环论之嫌，不如改用螺旋式上升为好。实则，螺旋式上升就是循环式上升，我们是不必为

名称多费心思的。周期性循环运动是许多事物的规律，正视这条规律，我们就不必为历史循环论担心了。

说封建社会形态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马克垚

我认为，社会形态学说是一种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正确理论和有效方法。当然这一学说也需要不断发展和修正，是单线论还是多线论，是三形态说还是五形态说，尽可以展开讨论。我只对封建社会有一点认识，愿就这一问题说几句不成熟的意见。

西欧工业革命以前的亚欧大陆上的主要文明，从其经济上看，大都可以说是以人力、畜力等为主要生产原动力，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小农经济）相结合，封建主对农民实行剥削的结构。近年来的研究指出封建时代晚期有些地方地权存在着分散化的趋势，小土地所有者多而大地主少，不过这并不能否定地主的存在。所以，封建社会应该是普遍存在的。我国的一些学者不愿意使用封建二字，认为西方的封建是指封君封臣关系，中国的封建是指封邦建国，二者不同。那是从政治体制上看问题，而不是从经济结构上看问题。何况，封君封臣制的政治体制和封邦建国形成的政治体制，也还有许多类似的地方。

目前我们使用的封建社会的诸多概念、定义，是由西方 19 世纪的法学家，大体上根据罗亚尔河和莱茵河之间的狭小地区、9—12 世纪短时间的情况逐渐推演而来的，如强调封君封臣的依附等级关系，庄园制、农奴制、自然经济的统治，王权微弱甚至无国家等等，这些即令放之西欧的封建时代也并不完全合适，但因袭的力量使它仍然是标准的封建模式。如果我国学者拿这样的模式来研究中国的封建，自然有许多窒碍难通之处。

例如，我们都说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可我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相当活跃，不好解释。80 年代后期学者们对此有过讨论，大致上肯定了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二元存在，有了突破。其实，西方学者从 9、10 世纪的情况得出了自然经济的看法，但他们分析封建时代的西欧经济使用的决不是自然经济的方法。他们把小农视为会对市场做出灵活反映，有经营头脑，追求发家致富的“经济人”；根据 13 世纪庄园经济商品率的增长，估计庄园主已经是企业家；对整个封建经济的估算，依据的是人口、物价、工资的变动曲线。这也很自然，因为经济学就是为研究资本主义才产生的，到现在为止可以说还没有封建主义的经济学。我们固守自然经济的说法，结果束缚了自己的头脑。

由于从庄园出发认定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所以西方学者大都认为商品经济是外于封建的，是封建社会的破坏力量，甚至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经济学家希克斯没有使用自然经济这个词，可是把封建经济归于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之间，仍然认为市场是封建之外的，要向封建经济渗透进来，起初是商业渗透，然后是金融渗透。如果根据中国的经验，则商品经济并不外于封建，而是封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实西方也是如此）；工商业中心的城市并不是封建的对立物，而是服务于封建的。西方的城市也并没有西方学者赋予它的那么大的神奇力量，似乎整个经济世界就是围绕着几个城市发展变化的（如布罗代尔）。我以为现在的问题是要设法区分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经济，找出其相同点与不同点。

关于封建时代的政治组织，我们大都认为西方是王权微弱，封建无政府状态，而东方是专